

# 清代越南北使詩文蠡探

## ——以李文馥和他的作品爲例

陳益源

(成大中文系教授)

### 壹、周遊列國的李文馥及其華夷之辨

#### (摘要)

在越南名儒之中，李文馥（1785～1849）的周遊列國，使他成爲越南十九世紀上半葉頻於接觸新世界的外交官員，而他的作品也成爲後人認識他以及他所處的新時代的重要根據。本文的寫作，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要考察從明命十一年（1830）起，李文馥在十幾年間不下十次周遊列國的目的、行程與內容；二是要觀察他在與外國接觸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特別是在他一些作品（如《西行見聞紀略》、《西行詩紀》、〈夷辨〉、〈呂宋風俗記〉、〈西夷致富辨〉、《粵行吟草》、《鏡海續吟》）中立場鮮明的華夷之辨。李文馥周遊列國，將他自己帶上了時代的尖端，讓他見識到了西方列強的進步與發達；然而他的華夷觀念卻是源自中國儒家舊有思想，也是越南由來已久的傳統，這又不免讓他在面對西方時流露出衝突與排斥的心理。透過李文馥豐富的遊歷經驗以及他內心的矛盾掙扎，我們所看到的正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會、新舊文明交替的大時代。

**關鍵詞：** 越南 李文馥 儒教思想 華夷觀念

## 一、前言

2007年11月20日，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到河內召開過一次「中越漢文學學術研討座談會」，會中發表論文19篇<sup>1</sup>，其中陳益源和阮氏銀不約而同地以李文馥（1785~1849）為研究對象，前者（〈李文馥與《二度梅》〉）意欲討論喃傳《二度梅》的作者是誰？它的成書跟越南著名外交家、文學家李文馥有什麼關係？但「並不急著要下什麼結論，而是想借此聽取越南文學與漢喃專家的高見」；後者（〈李文馥——XIX世紀前半之漢喃作家〉）則以更寬廣的角度來評價這位「第一個走到那麼遙遠的東南亞海國的越南人」、「越南第一個發現並看出一個新奇世界的人」——李文馥的文學成就，說他「一邊代表著儒教文章傾向，一邊代表著越南中代 XVIII-XIX 世紀在反映現實的潮流」。基於關注對象的一致，於是我們希望可以共同合作，一起來研究李文馥。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想先探討兩個問題，一是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李文馥的出國次數，以及他出使的行程、任務為何？二是他在這些與外國的接觸中，這位儒教名士在面對中國、面對西方時，有何感觸和堅持？特別是他那立場鮮明的「華夷之辨」的儒家思想，在一個東西文化交會、新舊文明交替的大時代裡呈現出什麼樣的矛盾與掙扎？

## 二、周遊列國的李文馥

首先，我們來談談李文馥的周遊列國。

根據《大南實錄·李文馥傳》的記載：

李文馥，字鄰芝，河內永順人，嘉隆十八年領鄉薦，明命初授翰林編修，充史館，累遷禮部僉事，協理廣義鎮務，兼管六堅奇，轉直隸廣南營參協，辦事多中窳，上嘉之，入為戶部右侍郎，署右參知。坐事削職，從派員之小西洋効力，又之新嘉波。尋開，復內務府司

<sup>1</sup> 這19篇論文，包括越南學者的〈《聊齋誌異》對越南現代傳奇小說的影響〉（范秀珠）、〈20世紀初中國文學、文化對越南的影響〉（陳海燕）、〈一部越南寶貴的漢喃雙語的最古詞典〉（吳德壽）、〈阮廌及其作品〉（阮文原）、〈李文馥——XIX世紀前半之漢喃作家〉（阮氏銀）、〈越南喃字（國音）文學概說〉（阮光紅）、〈《詩經》在越南的喃文翻譯概說〉（阮俊彊）、〈關於胡春香漢喃詩中女性意識的研究〉（陳竹瀾），和台灣學者的〈「竹林七賢」文化的流播〉（江建俊）、〈睦親與息諍——《袁氏世範》、《唐君公傳家規範》、《春亭家訓》中的家庭倫理〉（林朝成）、〈越南河內文廟碑文研究〉（林耀滂）、〈李文馥與《二度梅》〉（陳益源）、〈從唐代開元時期中日兩國文人贈和詩談越南使華詩研究之方向〉（王偉勇）、〈印刷傳媒與文風土習〉（張高評）、〈阮攸及其《清軒詩集》〉（吳榮富）、〈越南水傀儡戲曲探究〉（高美華）、〈辭章學與實際批評〉（仇小屏）、〈鄉土小說的「一女事二夫」情節及其風格變奏〉（蔡玫姿）、〈東西交流史上東亞漢文小說中的文化衝突〉（王三慶）。

務，管定洋船如呂宋、廣東公幹。又擢兵部主事，復如新嘉波，又累如廣東、澳門公幹。歷遷工部郎中，除工部右侍郎，兼奮鵬船如新嘉波。公回，署工部右參知，權理京畿水師事務。紹治元年，特授禮部右參知，充如燕正使。既而以外舶來沱汎，辦事不善，案擬發兵。尋開，復侍讀。嗣德元年，遷郎中，辦理禮部事務。明年，擢光祿寺卿。尋卒，追授禮部右侍郎。<sup>2</sup>

如果我們把上引傳中提到的每個外國地點，都看作是一次獨立的行動的話，那麼李文馥的出使便有「小西洋」、「新嘉波」、「呂宋」、「廣東」、「新嘉波」、「廣東」、「澳門」、「新嘉波」、「燕（京）」等九次之多。而事實上，要是我們配合李文馥存世的相關著作來作扼要統計（詳細的舉證，我們將另撰他文為之），可以發現他出使外國的次數，至少有以下十一趟：

時間	外國	任務	相關著作
1. 明命十一年（1830） 一～九月	小西洋	奉遴員分乘奮鵬、定洋之裏銅兩大船，多帶水師，遵海操演。（李文馥搭的是奮鵬號船）	《西行見聞紀略》、《西行詩紀》 （《西行詩略》）
2. 明命十二年（1831） 二～四月	新加坡	乘平海船往新加坡，任務不詳。	〈擬無名公自述賦并序〉
3. 明命十二年（1831） 夏～冬， 七～十二月	中國·福建	駕瑞龍大船，護送失風官眷陳榮等回福建省。	《閩行雜詠》
4. 明命十三年（1832） 夏～秋	呂宋	奉敕與同官管駕定洋船之呂宋地方，勾當公事。	《東行詩說草》、 《李文馥遺文》
5. 明命十四年（1833） 夏～冬	中國·廣東 （含澳門）	分乘平字一、平字七兩大船，護送廣東水師梁國棟失風戰船回廣東。（李文馥搭的是平七號船）	《粵行吟草》、《澳門誌行詩鈔》

<sup>2</sup> 引自《大南正編列傳二集》卷二十五諸臣列傳十五，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二十冊，頁274。

6. 明命十五年(1834)一~三月	新加坡	搭乘清洋號船，自茶山出發，第六次到外國。	〈舟回阻風嘆〉、〈自述記〉
7. 明命十五年(1834)夏~冬	中國·廣東	管駕平字五號船，護送風飄廣東水師外委陳子龍歸國。	《粵行續吟》
8. 明命十六年(1835)夏~冬	中國·廣東	捕獲解送搶掠於廣南洋分的三名水匪回廣東。	《三之粵集草》、《仙城侶話集》、《二十四孝演歌》
9. 明命十七年(1836)秋~冬	澳門	奉駕平洋號船到澳門，察訪師船音訊。	《鏡海續吟》
10. 明命二十一年(1840)	新加坡	兼奮鵬船如新嘉波。	缺(參見《大南實錄·李文馥傳》)
11. 紹治元年~二年(1841~1842)	中國·燕京	承廷臣遴舉使部，經由陸路如清，以國孝事告。	《使程誌略草》(《周原雜詠草》、《皇華雜詠》、《使程遺錄》)、《回京日程》、《使程便覽曲》、《使程括要編》

比起《大南實錄·李文馥傳》，上表所增加的第3趟福建之行和第7趟或第8趟的赴粵行程。李文馥第3趟出使，乃隨大官陳文忠、高有翼，駕瑞龍號大船，護送清國失風官眷陳榮等回福建省，此行撰有《閩行雜詠》一書，詳細記載了他在福建的所見所聞；至於他的二之粵或三之粵，也分別寫下了《粵行續吟》或《三之粵集草》、《仙城侶話集》、《二十四孝演歌》等作品。而這幾次出使到中國的經過，尚見載於中國《清實錄》、《清會典事例》和《廈門志》、《海南雜著》諸多書籍之中。

綜觀李文馥從明命十一年(1830)下小西洋効力起，到紹治元年~二年(1841~1842)奉使中國燕京告哀止，這十一、二年間至少有多達十一次的出國訪問，足跡遍及菲律賓(呂宋)、新加坡、馬來西亞(馬六甲、檳城)、孟加拉、印度(加爾各答)和中國(含澳門租界)等許多國家和地方，跟當年的外國人(中國人、南洋土著，和殖民東方的英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均有接觸，我們稱之為「周遊列國」乃名符其實，並非誇大其詞。

### 三、李文馥的華夷之辨

其次，我們想著重說說李文馥的華夷之辨。

中國幅員遼闊，各種民族複雜，文化水平不一，自古儒家尤重華夷之辨，影響所及，東亞地區日本、朝鮮、越南各國歷來也有同樣的思想；直至近代，每個國家以自我為中心，在面對鄰邦小國乃至西方殖民帝國時，多多少少都存在著一些排斥異己的心理。台灣學者朱雲影先生舉過一個「最可笑」的例子是：

越人既以「夷」視外國，而清人卻仍以「夷」視越南。越人潘叔直輯《國史遺編》頁三四六載：「紹治元年（一八四二）二月，遣侍郎黃濟美、郎中李文馥如清。……馥至燕，就館，見清人大書『越夷會館』四字於壁間，馥甚怒，誚讓館伴官，聲色俱厲，不入館，令行人裂碎夷字，乃入，仍作〈辨夷論〉以示之。其略曰：越南原聖帝神農氏之後，華也，非夷也，道學則師孔孟程朱，法度則遵周漢唐宋，未始編髮左衽為夷行者。且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世人不以夷視舜文也，況敢以夷視我乎。」越使見清人大書「越夷會館」，憤而作〈辨夷論〉，證明越南亦繼承中國文化傳統，乃「華也，非夷也」，真是理直氣壯，足使昏聩無知的清人愧死！<sup>3</sup>

熟悉李文馥作品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潘叔直輯《國史遺編》所載有誤，因為李文馥拒入「粵南夷使公館」，特作〈夷辨〉以示抗議的事件，是發生在明命十二年（1831）的福州，而非紹治元年的燕京；當年閩縣縣尹黃宅中認為〈夷辨〉「議論正大，佩服之至」，立刻把使館改名為「粵南國使官公館」；而李文馥那篇理直氣壯、洋洋灑灑近八百言的〈夷辨〉原文，我們現在還能完整看到，它就附在李文馥《閩行雜詠》第42首詩〈抵公館見門題夷字作〉的後面<sup>4</sup>。

在面對中國時，李文馥極陳治法本之二帝三王、道統本之六經四子，「家孔孟而戶朱程」的越南，是「華」非「夷」；不過，在面對西方時，他倒又認為當時「又舉之國而端之，而於吾人之綱常道義一棄而不顧」的「東西洋黠夷」：「稱之曰夷，固其所也！」

在李文馥撰寫〈夷辨〉（1831）之前之後，他先到過小西洋，見識到紅毛國人的科技進步與船堅炮利（《西行見聞紀略》、《西行詩紀》，1830），後來造訪了呂宋殖民地，則一再驚訝於爺蘇異教的違背三綱、五常（〈呂宋風俗記〉、〈西夷致富辨〉，1832），隨後又兩度去到澳門葡屬租界，仍然重申「西去幾番勞問俗，東遊又見講超魂<sup>5</sup>；華夷到底乾坤限，詭異紛紛曷足論」（《粵行吟草》，1833）、「文

<sup>3</sup> 引自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4月，頁299。

<sup>4</sup> 《閩行雜詠》，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1291；〈抵公館見門題夷字作〉詩曰：「自古冠裳別介麟，兼以天地判偏純。尼山大筆嚴人楚，東海高風恥帝秦。斗次輝華文獻國，星槎忝竊誦詩人。不憐一字無情筆，啣命南來愧此身。」

<sup>5</sup> 註云：「西夷爺蘇教。」

人筆墨還宜賈<sup>6</sup>，勝國冠裳孰變夷<sup>7</sup>」（《鏡海續吟》，1836）。

實際的情況是，李文馥周遊列國的豐富閱歷，將他自己帶上了新時代的尖端，讓他充分見識到西方列強的科技文明，不管是鐵橋、收雷鞭（避雷針）、運水機、火煙船、天文器或博物樓（博物館）等等，無一不比他在如清道上所見水踏車、馳車張帆者來得機智工巧，然而他卻怎麼也不肯真心接納西方的宗教與文明，始終不改其志地鄙之為夷，頻頻譏斥其「多狡譎，好欺騙」、「倨傲無禮」、「役財而驕」、「多耽嗜風流而浮放無檢束」、「最嗜利而冷淡無情」……<sup>8</sup>。這種處處流露出衝突與排斥的心理，既可能是出自他反殖民態度的一種自然反射，更可能是本源於中國與越南傳統儒家華夷觀念的牢不可破。

也許應該這麼說，身處於一個東西文化交會、新舊文明交替的大時代裡的李文馥，他那立場鮮明的華夷之辨，在面對中國時是超越種族的，理直氣壯的；在面對西方時是超乎文明的，不容妥協的。在他心中，是華或夷，端視其文化底蘊是否合於禮教綱常？而這樣的信念，正是做為越南名儒的李文馥一生所嚴遵奉行的準則。

弔詭的是，李文馥這位「真儒之家」<sup>9</sup>，在出使中國福建的那一年（1831），在乍見福州「粵南夷使公館」的當下，乃至在當年八月任憑總督孫爾準、已成摯友的閩尹黃宅中不斷勸說，甚至好不容易想出拿本《康熙字典》要他逐字自指的變通方法，他仍不肯敘寫皇帝御名的堅持到底<sup>10</sup>，何等不辱使命！到了紹治七年（1847）年春二月，他竟然會因為法國船隻在廣南省沱灤汛進行騷擾（道長五六人公然懸佩十字往來汛所，來意倨傲），身為禮部左參知的他奉命前往作為，卻阻擋不住洋夷頭目拉別耳率其黨數十人帶鎗劍直入公館挑釁，導致「帝怒其有虧國體，命錦衣枷禁于左，待漏解職，下廷議。」<sup>11</sup>從面對華人的「不辱使命」，到面對洋夷的「有虧國體」，在李文馥的內心深處，想必曾有一番刻骨的感受吧。

## 四、結 語

回顧越南本國學術界關於名儒李文馥思想的研究，無論是華憑《李文馥（1785~1849）》一書（升龍，1953年，凡九章75頁），探討其崇拜中國聖賢，相信天公造化、孝道觀念等儒教思想，或者像阮董芝在他〈阮朝出色外交鬥爭筆頭——李文馥〉（1979）一文，分析其充滿友誼情感與人道精神及其民族自豪感與愛國思想相結合之外交筆墨，都已體現出李文馥文學作品（不論是詩歌還是論

<sup>6</sup> 註云：「澳門唐人多為夷人掌貨簿。」

<sup>7</sup> 註云：「洋人濯衣皆曝於山上。」

<sup>8</sup> 詳見《西行見聞紀略》之「氣習」編，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43。

<sup>9</sup> 語見華憑《李文馥（1785~1849）》，升龍，1953年。

<sup>10</sup> 詳見《閩行雜詠》內附之〈御名不肯抄錄問答〉一文。

<sup>11</sup> 詳見《大南實錄正編第三紀》卷六十五，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十四冊，頁371。

說)的高度成就。

近來，國際間又逐漸重視起李文馥作品的研究價值，例如中國大陸學者陳文源即撰有〈清代越南仕宦李文馥與《鏡海續吟》〉一文，肯定《鏡海續吟》「對清代澳門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sup>12</sup>；美國歷史學者 Liam C.Kelley 也在他的〈越南儒教〉<sup>13</sup>，把李文馥作的〈夷辨〉所含的華夷觀念視為越南各王朝儒教的看法；馬來西亞學者黃子堅剛剛發表〈李文馥與其《西行見聞紀略》：一個越南儒家看東南亞海島〉<sup>14</sup>，肯定李文馥以一個儒家官吏的見解來探討已被西方殖民的亞洲版圖，具有諸多觀察的準確性。

我們殷切期盼，國際間合作整理新的《李文馥全集》，共同全面研究十九世紀上半葉這位越南名儒李文馥的契機盡快到來。大家眼前這一篇關於李文馥的周遊列國及其華夷之辨的談說，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李文馥新階段的整體研究的開端之一而已。

## 貳、李文馥筆下的亞洲飲食文化

### (摘要)

李文馥(1785~1849)，是越南十九世紀上半葉著名的詩人、外交官。他從1830年起，在十幾年間，出訪外國不下十次，寫下了十幾部詩文集。本文在簡述李文馥個人的飲食偏好與書寫習慣之後，主要依據他的出使遊記作品(《西行見聞紀略》、《西行詩紀》、《閩行雜詠》、《東行詩說草》、《李克齋粵行詩》、《鏡海續吟》、《使程誌略草》、《周原雜詠草》……等)，來介紹他筆下所記錄的十九世紀初的亞洲飲食文化，主要內容包括1830年東南亞與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孟加拉、印度加爾各答)的飲食文化、1832年菲律賓(呂宋)的飲食文化、1831年~1841年中國(福建、廣東及其他)的飲食文化。相較之下，他對呂宋、東南亞與南亞的飲食活動比對中國更感興趣；出現在他筆下的，十九世紀初從西方傳來的西洋飲食文化，又遠比亞洲本地原住民族的飲食記錄為多。所以我們透過李文馥的作品所看到的十九世紀初的亞洲飲食文化，是充滿西洋色彩的。

<sup>12</sup> 該文收入張玉春主編《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7月，頁278~285。

<sup>13</sup> 2007/07/26，www.talawas.org。

<sup>14</sup> 「2007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主辦，2007年11月2日。

關鍵詞：越南、李文馥、中國、馬來西亞、飲食文化

## 一、前言

李文馥，字鄰芝，號克齋，河內永順人，生於越南景興四十六年（1785）。他的祖先原籍「福建處漳州府龍溪縣西鄉社二十七都」，明清之際渡海移居越南，到李文馥已是第六代<sup>15</sup>。根據《大南實錄·李文馥傳》的記載，李文馥於嘉隆十八年（1819）領鄉薦，開始當官；他在擔任戶部右侍郎時，「坐事削職，從派員之小西洋効力，又之新嘉波」；後來復職，任內務府司務，「如呂宋、廣東公幹」；又擢升兵部主事，「復如新嘉波，又累如廣東、澳門公幹」；任工部右侍郎時，曾「如新嘉波」；紹治元年（1841），特授禮部右參知，「充如燕正使」；後來由於「外舶來沱汎，辦事不善」，差點被發配充軍；越南嗣德二年（1849）卒，追授禮部右侍郎。他在宦海浮沉三十年，「多在洋程効勞」，是十九世紀初期一位走向世界的越南著名官員，也是一位見多識廣的詩人，著有《西行見聞錄》、《閩行詩草》、《粵行詩草》、《粵行續吟》、《鏡海續吟》、《周原雜詠》等諸多詩文作品。<sup>16</sup>

《大南實錄·李文馥傳》所說的「坐事削職」，事情是發生在明命十年（1829）二月，罪名是接受賄賂，十月案成，收押候絞，隨後獲得特赦，派往洋程効力，次年正月啓程<sup>17</sup>。就從明命十一年（1830）起，直到紹治七年（1847）二月由於法國船隻在沱汎進行騷擾，李文馥處理失當而被解除禮部左參知一職為止<sup>18</sup>，前後有十七年的時間，他不是奉派出國，就是在管理水師事務。李文馥在這十幾年間，歷經不下十次的出訪，行跡遍及菲律賓（呂宋）、新加坡、馬來西亞（馬六甲、檳城）、孟加拉、印度（加爾各答）和中國（含澳門租界）等地，寫下了十幾部詩文集。本文主要依據的就是李文馥這些出使作品，來介紹他筆下所記錄的十九世紀初亞洲的飲食文化。

<sup>15</sup> 詳見李文馥明命二年（1821）修纂的《李氏家譜》，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1057。他寫於在明命十二年（1831）的《閩行雜詠》第一首〈得命如閩喜賦〉，也曾說道：「福建，古閩粵大地，且余之祖籍也。……余六代祖，閩之龍溪人，為明朝科宦顯閥。」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1291。

<sup>16</sup> 詳見《大南正編列傳二集》卷二十五諸臣列傳十五，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二十冊，頁 274。

<sup>17</sup> 詳見李文馥《西行詩記》，但其開篇〈忽聞恩旨感作〉只說：「己丑（1829）二月，余方參戶政，尋獲譴，二月解職，至十月而案成」；至於相關案情，曾記載於《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六十二，己丑明命十年冬十月：「署戶部左參知李文馥有罪下獄。先是狡商廖寧泰、杜輝松謀領北城關稅，馥受賄銀百餘兩，為之代題，事覺，下刑部查議。至是案成。……留馥，尋派往洋程効力。」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七冊，頁 22。

<sup>18</sup> 詳見《大南實錄正編第三紀》卷六十五，丁未紹治七年（1847）年春二月：「哂<sup>閩</sup>晒師船二艘泊沱汎，道長五六人公然懸佩十字，往來汎所。廣南省臣察其來意倨傲，以事飛奏。命禮部左參知李文馥前往作為……。帝怒其有虧國體，命錦衣枷禁于左，待漏解職，下廷議。」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十四冊，頁 371。



## 二、李文馥個人的飲食偏好與書寫習慣

在介紹李文馥筆下所記錄的十九世紀初亞洲飲食文化之前，有必要先簡述一下李文馥個人的飲食偏好與書寫習慣。

李文馥自幼深受祖父李克敦的疼愛，「自一飲一食，必親視之」。他小時候多病，特別愛吃甜食，母親曾趁他祖父不在，偷偷拿糖餅餵他，不過他祖父一旦發現，便用手指把餅挖出來，以免他貪甜致病<sup>19</sup>。

中年以後的李文馥，愛寫詩，好下棋，善飲茶，不嗜酒<sup>20</sup>。他雖然不是素食者，但可能長期吃素，明命十五年（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第二次到廣東時，與同僚陳秀穎、杜俊大唱和〈食菜〉詩，有「平生慣藿食」之句<sup>21</sup>；紹治元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出使燕京歸途上，「一路官款日三餐，肉品羅列」，自稱「不喜肥膏」的他還寫了一首〈肉食戲呈諸同事〉，詩曰：

讀書非是志膏粱，濃淡何妨世味嘗。  
萬里冠紳存體面，半生藜藿易肝腸。  
坐嘗對竹能消鄙，交到如蘭更覺香。  
迂拙獨慚尸素分，謾誇酬應老文章。<sup>22</sup>

李文馥喜歡以詩會友，在各地的旅途中免不了有許多應酬，但他喜愛吟詩勝過飲讌，例如明命十四年（清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九日他人在廣東，南海陳任齋與一二文士邀他和同官作花苑泛舟之遊，返程換坐樓船，因詩興正濃，於是設為觴詠會，彼此唱和，任齋還找來四名歌姬以絲竹侑觴，不斷酬勸，李文馥先是忙著寫詩，不久以夜遊不雅，沒等到宴席終了就先叉手為別。這次樓船會提前離席的事，讓他的茶丁頗感遺憾，而他自己則對茶丁的反應覺得好笑。<sup>23</sup>

越南節令與中國幾乎相同，李文馥經常在外國過年過節，感觸尤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許多書寫元旦、端午、七夕、中秋、重九情懷的詩作，但除了端午「蒲卮酌罷出東洋」<sup>24</sup>、中秋「或圓月餅之筵」<sup>25</sup>一兩句之外，極少出現關於節

<sup>19</sup> 詳見《李氏家譜》，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1057。

<sup>20</sup> 明命十三年（1832）李文馥出使呂宋前，臨行時高希馮郎中餞詩一首，有注云：「先生茶飲法尤為精細」、「先生不嗜酒」，詳見李文馥《東行詩說草》附錄，《東行詩說草》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一書之中，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VHv.184。

<sup>21</sup> 〈食菜〉詩載於《仙城侶話集》（抄錄在《鏡海續吟》，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303）、《三之粵集草》（抄錄在《周原雜詠草》，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1188）。

<sup>22</sup> 引自李文馥《皇華雜詠》，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1308。

<sup>23</sup> 詳見《粵行吟草》之〈偕同官泛舟之花苑遊玩〉、〈樓船會即席和陳任齋見贈并記其事〉、〈聞茶丁提及樓船會不覺笑成〉等詩，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

<sup>24</sup> 詩見《東行詩說草》之〈端午起程別諸生〉，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

令飲食習尚的描寫。

如此看來，李文馥並不注重美食，而且詩比文多。了解了他的飲食偏好與書寫習慣以後，我們其實已經可以不必太過寄望要從他的遊記書寫之中獲得大量的飲食文化描述了。

話雖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李文馥的作品中，找到一些 1830 年東南亞與南亞的，1832 年菲律賓（呂宋）的，和 1831 年～1841 年中國的飲食文化記錄。因為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十九世紀初的這些亞洲飲食文化（特別是當年傳入亞洲各國的西洋飲食習慣），對李文馥這位越南詩人而言，多少還是有其新奇之處，尚能引起他予以記錄的興趣。

### 三、1830 年東南亞與南亞的飲食文化

明命十年（1829）冬十一月，越南國王「遣副衛尉阮仲併、加協鎮銜陳震等，乘奮鵬、定洋諸號船，如小西洋公務」<sup>26</sup>。根據李文馥撰於明命十一年（1830）八月十三日的〈《西行見聞紀略》序〉的記載，他們是：

庚寅（1830）春，奉派駛奮鵬、定洋二大船，前往小西洋之英咭喇國明歌鎮洋分，操演水師。以新正十八日自廣南沱濃汛起旋，六月達其境，途經新咖波、嗎粒呷、檳榔嶼等地方，乃抵明歌鎮治津次，停宿數月而返。<sup>27</sup>

此行，李文馥沿途寫下不少作品，有「《見聞錄》、《日程記》、《舟行賦》、《海行吟》、《仇大娘張文成演義》等作」<sup>28</sup>，但如果要察考他這一年遠赴小西洋的行程細節，目前所見最詳者當推他的《西行詩紀》。

《西行詩紀》，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的《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說這本李文馥詩集：「收錄明命十五年（1830）作者出使新加坡期間的詩作四十五首、賦一篇」<sup>29</sup>，它除了把「明命十一年」誤作「明命十五年」之外，說這是出使新加坡期間的詩作也不對，詩集最後一篇〈擬無名公自述賦并序〉則作於明命

---

書，編號 VHv.184。

<sup>25</sup> 詩見《粵行吟草》之〈中秋玩月賦〉，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

<sup>26</sup> 引文見《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六十三，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七冊，頁 38。

<sup>27</sup> 《西行見聞紀略》，有一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43。書前的〈《西行見聞紀略》序〉，署「嗣德十一年（1858）八月十三日」，「嗣德」當是「明命」之誤抄，「八月十三日」仍在西行返程途中。

<sup>28</sup> 引文見於《西行詩紀》內〈得旨由富安登陸程〉詩「海程撫集幾盈篋」句下的注文，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550。

<sup>29</sup>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12 月，頁 673。

十二年四月，其實也不屬於明命十一年小西洋之行原有的作品。

經查《西行詩紀》原書，我們可以知道全書從〈忽聞恩旨感作并語〉到〈喜豚子郁與家人來〉，有詩四十八首，詳細記載著他們正月十八日從廣南開船，繞嘉定崑崙島，自將軍帽以下進入「紅毛國」海域，途經豬母山、豬子山、馬鞍山、新加坡、馬拉呷、檳榔嶼、食人國，四月初九進入明歌鎮港口，六月二十三日離港，中秋節仍在海上，八月十八日回抵越南富安，九月十二日才得旨登陸……。李文馥一生至少到過新加坡四次<sup>30</sup>，這是第一次，但這次出使地點涵蓋東南亞與南亞地區，並非只有新加坡。

關於 1830 年東南亞與南亞的飲食文化，《西行詩紀》未作有系統的介紹，只見零星記載，例如他看到豬母山、豬子山時，有詩云「煙霞吞吐知多少，也自闍閩不食來」，反映過去統治南洋地區的闍閩國「最忌豬肉」的飲食禁忌；此外，他特別提到南亞有生食、食人的島國：

去檳榔十餘日，船路之右，有一國名阿喇<sup>阿</sup>者，居海島中，不屬紅毛管轄，從亦未常相惡，其國人皆生食。更有一樣人，居于左邊之黑鬼島，尤嗜人肉，舟過皆避之。<sup>31</sup>

對於 1830 年東南亞與南亞飲食文化的有系統介紹，當借重李文馥小西洋之行的另一部散文遊記《西行見聞紀略》。

《西行見聞紀略》正文區分為「名號」、「人物」、「氣習」、「衣服」、「飲食」、「文字」、「禮俗」、「官事」、「時候」、「屋宇」、「車乘」、「貨幣」、「舟船」、「地產」等十四類，並附錄「孟牙啦」、「謨<sup>阿</sup>」、「闍閩」三國風俗。

李文馥在「名號」編內說明他所記錄的對象是「英咭喇國」(亦號「紅毛國」)，範圍包括新加坡鎮(即今新加坡)、馬拉呷鎮(即今馬六甲)、檳榔嶼鎮(即今檳城)、明歌鎮(即今加爾各答)。他筆下所稱「國人」，主要是指當初殖民東南亞與南亞的英國人。關於當年英咭喇人的飲食文化，他曾在「氣習」、「官事」、「地產」各編內簡略提及英國人製造阿芙蓉(鴉片)、藥品，禮拜日(遊冥日)不上班閉門酣飲為樂的情況，以及當地食用、果樹、物畜之產的品類<sup>32</sup>，不過最有系

<sup>30</sup> 第一次是 1830 年，乘「奮鵬號」船，參見《西行見聞紀略》；第二次是 1831 年，乘「平海號」船，參見〈擬無名公自述賦〉；第三次是 1834 年，乘「清洋號」船，參見〈舟回阻風嘆〉；第四次是 1840 年，參見《大南實錄·李文馥傳》。

<sup>31</sup> 引文見《西行詩紀》內之〈食人國·并引〉，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550。

<sup>32</sup> 《西行見聞紀略》「氣習」編有云：「國人多狡譎，號欺騙……。又此阿芙蓉一物(唐人謂之鴉片，又謂之洋煙)，吃之令人耗其精血，而蕩其家產，乃國人多業煮作，以售于人，而通國上下無一人肯吃之者，其狡類此」、「其藥多製入酒醋，鮮用湯濟」；「官事」編有云：「每七日，展辦(辦)事一日，咸詣道堂禮拜，謂之禮拜日。……禮拜畢，官民各以類聚，互相往來，開(閉)門酣飲為樂，故又謂之遊冥日」；「地產」編則曰：「食用之產，其粟米菽麥、白糖石糖，以至魚鹽蔬菜之類，不可勝用。其糯米最希少，餘亦如常。惟鹽則多異樣，有粒細而色黑者，有清光成塊如水晶石者。葱則多赤色，而其大如水仙根者，食之覺有甘味。……果樹之產，其葡萄、荳(菘)、包蕉、柳(椰)子、百眼子、橙子、大檬之類，不可勝用，餘亦如常。物

統的描寫還是集中在「飲食」編中。

《西行見聞紀略·飲食》主要可分為用餐習慣、飲酒風俗、抽煙方式三方面。在用餐習慣上，他說紅毛國：

國人飲食概不用箸，亦不用手掬，純用刀匙，以為取食之用。其食味多嗜肥膏，其飲水多以甘糖調勻之。富顯之家每款接賓客時，多不用茶，惟飲以黃牛乳汁；尤重者，飲以羊乳汁。其製以姜汁調入乳汁中，蒸沸取出，用糖勻之，乘熱氣而飲，可以補人氣血。<sup>33</sup>

在飲酒風俗上，他提到英國人多嗜酒，酒類多達數十種（如金露茴香、玉露茴香、佛手甘香，以至安圻里益茲黎等名色），在宴客時怎麼喝酒，飯後要吃水果等，均有講究：

初飲以紅葡萄（萄）酒，味甚酸澀，飲之不見有酒氣，而可以化食；次飲以麻紙（低）酒，其色淺黃，其味辛甘相半；又次飲以猛酒，其色減（淺）紅，其味極辛辣剛猛，飲時須用清水彊半調之，不然令人沉醉，不堪受；最後飲以醇酒，其色多黃，其味甘而香，飲之不覺其厭。每飲一旬，各換食一次，前三次猶用麥麵芋薯相間，最後一次乃用飯，飯之後另換一番果品。<sup>34</sup>

在抽煙方式上，他則注意到有水煙、捲煙二種：

國人亦多嗜吃煙，煙瓶多用椰殼為之以積水。富顯之家往往包以銀錫，或純用玻璃為之。瓶上長管高可五六寸，管之口另設蓋以盛煙藥，管之邊橫出一攣，屈曲而長，以承口氣。吃煙時，以火炭置於煙藥之上，更三五人吃之，數更乃盡。吸之時，瓶中淙淙有聲。其煙藥，則熬煉成塊，如糕（糕）餅然。又則（別）有一樣，不用煙瓶，但以煙藥（葉）卷而吃之云。<sup>35</sup>

以上所言，都是 1830 年殖民者帶到東方的西式飲食文化，李文馥 1830 年西行顯然對於殖民的「英咭喇國」較為好奇，連洋人夫妻與賓客同桌「其妻每代為把斟勸飲以致慙慙」<sup>36</sup>，他也不忘記上一筆；至於當年東南亞與南亞地區本土的飲食文化，李文馥《西行見聞紀略》的附錄中只簡單提到「孟牙啦」國（位於今

---

畜之產，其馬多高碩，其羊多大尾，其犬多叢毛，其黃牛與豕而色白者尤多，除（餘）亦如常，惟象類最希少。」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43。

<sup>33</sup> 引自《西行見聞紀略》「飲食」編，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43。

<sup>34</sup> 同上註。

<sup>35</sup> 同上註。

<sup>36</sup> 引自《西行見聞紀略》「禮俗」編，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43。

之孟加拉與印度西孟加拉邦)有吃檳榔的習慣<sup>37</sup>，以及他們禁食牛肉、豬肉的嚴格禁忌：

飲食則概用手掬。其食味最忌黃牛肉、豬肉。途遇有攜挈其肉者，避之如仇，即自家廚灶處適有食牛、豬肉者入其戶，則雖現方烹煮之飯瓶食器，亦皆擲而棄之，不少顧惜，甚至自家日用之碗碟亦概不容人治唇，蓋恐其有牛、豬肉氣之餘染也。至如羊、鴨、魚等肉，亦惟親自烹調乃食之，若製自他人之手，則一滴亦不以入口。<sup>38</sup>

又說「謨<sup>口徒</sup>」、「闍<sup>閩</sup>」的飲食也跟「孟牙啦」相同，差別只在於「謨<sup>口徒</sup>」只忌豬肉，不忌黃牛而已。

#### 四、1832 年菲律賓（呂宋）的飲食文化

越南明命十三年（1832）的端午節，李文馥乘「定洋號」船起程，出發前往位於越南東方的呂宋，六月初六日抵達，寫下了《東行詩說草》，收詩三十首，附錄《瑣說六則》。三十首詩之中，只有一兩首提到當地耶穌教徒做禮拜、過聖誕節的情況，如〈土俗遊冥日作·并引〉云：

洋之西諸從事爺蘇者，其官若民七日一詣道堂誦拜，謂之禮拜日。其日公私漠不理事，禮畢輒往來酣飲，閉戶為樂。又謂之遊冥日。呂宋為甚。<sup>39</sup>

這樣的說法，跟他《西行見聞紀略·官事》所記 1830 年東南亞與南亞的英咭喇人做禮拜的習慣完全一致。

李文馥對於呂宋風土人情的介紹，主要見於《瑣說六則》中的一篇〈呂宋風俗記〉，該記舉凡衣服、文字、信仰、婚嫁、喪葬等，都有簡要的記述，但在飲食方面只有一句「飲食以手無匕箸」而已，不過我們可以肯定這句話講的正是呂宋本地土著的飲食方式，因為據李文馥對其呂宋當年宗主國「<sup>口</sup>泊嚕」（西班牙）的觀察：

至若<sup>口</sup>泊嚕，大約與紅毛國略同。紅毛習尚，則已見余所著《西

<sup>37</sup> 原文作：「又其人多嚼芙蓉<sup>齒</sup>，嚼時用乾榔仁調石炭，外以芙蓉<sup>齒</sup>兩三葉包之，亦有採乾榔仁蒸（蒸）成糕餅者。」

<sup>38</sup> 引自《西行見聞紀略》「附錄」，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43。

<sup>39</sup> 引自《東行詩說草》第十三首，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

行見聞錄》中，總之與呂宋差不多，不可贅。<sup>40</sup>

此外，《瑣說六則》中另有一篇〈西夷致富辨〉，也說：「西洋諸夷，如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孟牙拉，以至於[ ]泊嚕等處……，飲食則美酒嘉穀，而以玻璃為杯盞，以白金為匙勺……」<sup>41</sup>，可見在李文馥看來，1832年呂宋島上的西班牙飲食文化，跟1830年東南亞與南亞的英咭喇人，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 五、1831年~1841年中國的飲食文化

李文馥在戶部任職期間，原本早有機會出使中國，後來因故作罷<sup>42</sup>。他第一次奉派到中國，是在明命十二年（清道光十一年，1831）的六月到十二月。那年夏天，越南國王派遣工部郎中陳文忠、禮部員外郎高有翼，以「瑞龍號」大船護送前故彰化縣知縣李振青眷屬（監生陳榮等人）及遭風難民回廈門，船上有衛尉黎順靖帶同革員效力李文馥等百餘人，並載有「肉桂、砂仁、燕窩、沉香、象牙、犀角、黃蠟、白錫、烏木、錦紋木、白糖、蝦米、魚乾、白兔皮」等貨物。<sup>43</sup>李文馥此行，撰有《閩行雜詠》，賦詩近七十首，但其中只有一處注云：「（西螺）地名，產柑，會席有設」，並加按語道：「其地有東螺柑、西螺柑，而西者佳；又有東浦酒、西浦酒，而東者佳。」<sup>44</sup>

後來在明命十四~十七年（清道光十三~十六年，1833~1836），李文馥連續四年奉派到中國廣東：明命十四年（1833）他搭「平七號」船，護送廣東水師梁國棟失風戰船返粵<sup>45</sup>，撰有《粵行吟草》（此行他還順便去了一趟澳門，作《澳門誌行詩鈔》）；明命十五年（1834）他搭「平五號」船，送廣東水師外委陳子龍失風師船返粵<sup>46</sup>，撰有《粵行續吟》；明命十六年（1835），他負責解送三名在越南被捕的海盜回廣東，撰有《三之粵集草》、《仙城侶話集》、《二十四孝演歌》等書；明命十七年（1836），他又搭乘「平洋號」船，專程到澳門察訪越南「平等

<sup>40</sup> 引自《東行詩說草》附錄之《瑣說六則》第一則，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呂宋風俗記〉亦見於《李文馥遺文》第一篇，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502。

<sup>41</sup> 引自《東行詩說草》附錄之《瑣說六則》第六則，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西夷致富辨〉亦見於《李文馥遺文》第二篇，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502。

<sup>42</sup>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一首〈得旨如粵〉，有注云：「余昔參戶政辰（時），廷議曾有燕使之舉，竟弗果，迺於辛卯夏護送難眷之閩，今復以事之粵，或者以為之兆耶。」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

<sup>43</sup> 詳參《大南正編正編第二紀》卷七十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複印本，第七冊，頁168；《廈門志》卷八〈番市略〉，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53。

<sup>44</sup> 詳見李文馥《閩行雜詠》之〈留別許少鄂司馬〉，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1291。

<sup>45</sup> 此事，《清會典事例》禮部卷五一三曾有記載。

<sup>46</sup> 此事，《清實錄》卷二五五、《清會典事例》禮部卷五一三均有記載。

號」師船遭風音訊<sup>47</sup>，撰有《鏡海續吟》。李文馥這四次來到廣東，停留時間少則三個月，多者達半年以上，許多重要節日都在中國度過，也跟很多中國文人互有詩文酬唱，不過他絕少述及飲食活動，只是偶然提到此地「丹荔紅蓮多美品」<sup>48</sup>，朋友陳任齋「送別交梨春酒一瓶」<sup>49</sup>等寥寥數語而已。他的兩度澳門之行，對於這個西夷（葡萄牙）租界「瑪<sup>口</sup>美城」，無論是「設爺蘇教院，置海防礮臺」，或「博物樓」，以及「澳門唐人多為夷人掌貨簿」、「洋人濯衣皆曝於山上」，乃至使用玻璃窗、鉛筆等習慣，都進行了細致的觀察<sup>50</sup>；至於當地的飲食文化，大概是因為澳門已「別成西洋一世界」，跟他在呂宋、東南亞與南亞所見一致，所以付諸闕如。

李文馥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奉派到中國，是在紹治元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國孝事如清告哀<sup>51</sup>。和前五次不一樣的是，他這次是遵循慣例，由陸路前往燕京，費時較久，一行二十人自閏三月出發，隔年二月才返回越南。此行他撰有散文《使程誌略草》和名為《周原雜詠草》、《皇華雜詠》、《使程遺錄》、等內容大體一致而多寡不一的詩集，另外又撰有《回京日程》<sup>52</sup>（附錄喃詩《使程便覽曲》），編有《使程括要編》。他在作品中不厭其煩地詳載使程的路線、里程、山川、城鎮、驛館，以及沿途地方官員致送土宜、食品等禮俗，和所過祠廟、祭品內容的各種細節，偶而可以看到一些跟當地物產有關的文字，例如去程：

（六月）初五日……近嘉魚縣城津次泊，縣員送好如前。按：嘉魚江多豚魚，浮沉水面，叫聲如豬，土人不敢說魚名。……二十三日，午至鄆城住。按：鄆城……柳樹成行，米少價貴，民居土屋，服用樸簡，田間多樹高粱（梁），珠葉似紅，苓而高，粒似米而員（圓），葉飼騾，樹偏（編）席，穗為箒，無一棄者。<sup>53</sup>

回程再經嘉魚縣時，他還作了一首〈嘉魚夕泊〉，詩題下有注云：

<sup>47</sup> 此事《清實錄》卷二九五、《清會典事例》禮部卷五一二均有記載。

<sup>48</sup> 詩見《粵行吟草》之〈戲贈黃連鄉張居士〉，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

<sup>49</sup> 引自《粵行吟草》之〈留別陳任齋〉注文，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

<sup>50</sup> 詳參《粵行吟草》之〈以事之澳門和同舟梁毅庵二首〉、〈澳門即事〉、〈登洋人博物樓〉、〈《澳門誌行詩抄》序〉諸作（抄錄在《李克齋粵行詩》，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VHv.184），以及《鏡海續吟》之〈敘〉、〈澳門即事〉、〈澳門諸夷有識華字者〉諸作（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303）。陳文源〈清代越南仕宦李文馥與《鏡海續吟》〉一文曾肯定《鏡海續吟》「對清代澳門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文收入張玉春主編《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7月，頁278~285。

<sup>51</sup> 此事，《清實錄》卷三五四亦有記載。

<sup>52</sup> 《回京日記》又名《上京驛程詩記合錄》，內容包含《回京日程記》、《回京日程國音》和《回京日程詩》，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VNv.217。

<sup>53</sup> 引自《使程誌略草》，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150。

嘉魚縣屬武昌府，佳魚最多，價甚賤。<sup>54</sup>

整體而言，李文馥在對於中國各地飲食文化的記載，並不熱衷。

## 六、結 語

以上，我們主要依據李文馥十幾部出使詩文作品，依序介紹他筆下所記錄的十九世紀初的亞洲飲食文化，包括 1830 年東南亞與南亞的飲食文化，1832 年菲律賓（呂宋）的飲食文化，和 1831 年～1841 年中國的飲食文化。

由於李文馥個人不喜肥膏，出使遊記又以詠詩為主，散文偏少，故對各地飲食文化著墨不多。他雖有六度出使中國的經驗，但不太記錄中國飲食，這可能是因為中國飲食習慣與他越南本國近似，他不會覺得有多寫的的必要。相較之下，他對呂宋、東南亞與南亞的飲食活動比對中國更感興趣。不過，出現在他筆下的，十九世紀初從西方傳來的西洋飲食文化，又遠比亞洲本地原住民族的飲食記錄為多，這也反映出當年東西飲食文化仍呈現著明顯的差異，所以能引起李文馥的好奇與注意。

整體看來，李文馥雖然不怎麼重視飲食，但他在不斷出訪的旅途上還是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真實的見聞記錄。透過他的作品，我們發現十九世紀初的亞洲飲食文化其實已充滿西洋色彩，至於東方各國傳統的飲食文化，卻可能因為大家習以為常而反倒黯然失色。

那麼，如果我們想要對十九世紀初的亞洲飲食文化有更全面的了解的話，李文馥的所見所聞絕對有他無可取代的價值，但也必然是很受侷限的（例如他的作品就沒有記錄到他越南本國的飲食文化），非得參考更多同時期的各種著作不可<sup>55</sup>。

<sup>54</sup> 引自《周原雜詠草》，抄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805。

<sup>55</sup> 清道光十五年（1835），台灣澎湖秀才蔡廷蘭（1801～1859）漂流到越南中部廣義省，幾經周折，終於從陸路返回中國，寫下遊記《海南雜著》，該書第三部分〈越南紀略〉留有十九世紀初越南飲食文化的真實記錄，正好可以提供我們參考：「飲食，設一銅盤（無銅盤則為不敬）置席上，列肴饌其中。酒甚醇，冷酌。牛、豕、魚肉，半生熟（肉食無烹飪，以帶血未熟者為甘美，每物只少許，一箸可盡）。復供數大盤，率切生菜，雜生草，和鹹魚汁啖之（炊器用銅鑊，號木扣，故多食草菜，以解銅毒；又無醬油，以魚汁代之，甚腥臊）。飯畢，以手洗面（不用臉布），人進順化茶一盞（順化即王城所在，今改富春，地產茶，能解銅器毒，亦消暑氣，味甚苦澀）。以紙條捲烟草葉，燃火吸之（不用烟筒）。常啖檳榔，多黑齒。」（引文見於陳益源校錄〈越南所藏《海南雜著》抄本〉，載於陳益源著《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8月，頁167。）